



鄧小平

的發展觀

劉家俊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J102868

A849

7

刘家俊 著

邓小平的发展观

湖北人民出版社

## 鄂新登字 01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的发展观/刘家俊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3  
ISBN 7-216-02219-x

I. 邓...

II. 刘...

III. 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评论

IV.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207 号

### 邓小平的发展观

刘家俊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234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9.375  
插页:5

版次:199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40

定价:13.50 元

书号:ISBN 7-216-02219-x/D·415

DT83/27

## 目 录

### 绪 论

- 一、“很朴实的東西,很朴实的道理” ..... 2
- 二、“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 13

### 第一编 发展辩证法

- 第一章 “发展”的辩证概念 ..... 21
  - 一、“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 ..... 21
  - 二、“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 33
  - 三、“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 ..... 46
- 第二章 “发展辩证法”的基础 ..... 61
  - 一、“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 61
  - 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 ..... 70
  - 三、“我是实事求是派” ..... 80
- 第三章 “发展辩证法”的本质 ..... 96
  - 一、“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 96
  - 二、“都来做群众解放思想……的工作” ..... 104
  - 三、“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 112

## 第二编 发展交往论

|                                    |     |
|------------------------------------|-----|
| 第四章 发展性交往的历史条件·····                | 123 |
| 一、“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 | 124 |
| 二、“闭关自守·····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     | 129 |
| 三、“提倡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展正常交往”·····           | 133 |
| 第五章 发展性交往的正确决策·····                | 142 |
| 一、“我们千万不要当头”·····                  | 142 |
| 二、“投资者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             | 149 |
| 三、“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               | 157 |
| 第六章 发展性交往的价值意义·····                | 165 |
| 一、“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的”·····        | 166 |
| 二、“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              | 174 |
| 三、“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           | 185 |

## 第三编 发展工具论

|                           |     |
|---------------------------|-----|
| 第七章 市场经济的工具性·····         | 195 |
| 一、“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 196 |
| 二、“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       | 206 |
| 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 214 |
| 第八章 社会主义的工具性·····         | 219 |
| 一、“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   | 220 |
| 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 228 |
| 第九章 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工具性·····      | 235 |
| 一、“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     | 236 |
| 二、“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 | 245 |

## 第四编 发展平衡论

|                              |     |
|------------------------------|-----|
| 第十章 主体文明的思路.....             | 253 |
| 一、“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         | 253 |
| 二、“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 .....       | 258 |
| 第十一章 共同富裕的战略.....            | 266 |
| 一、“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 266 |
| 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272 |
| 第十二章 全面发展的人学.....            | 281 |
| 一、“陈景润……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 282 |
| 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 | 288 |

## 绪 论

邓小平,这位世纪伟人,在他近 90 高龄时,仍然风尘仆仆地辗转奔波于祖国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之间,他一路视察,一路思考,一路呼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sup>①</sup>这既给继往开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指明了坚定不移的实践行为准则,又提出了需要不断搞清楚的历史性的理论课题。

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特定角度,研究邓小平的理论及其具有传奇色彩的实践,就会发现邓小平有着异常丰富、系统、开放的关于“发展”方面的“硬道理”即“发展观”。并且不仅仅如此。邓小平的“发展观”作为一条主线,还全面贯穿于他的全部理论的始终。从人类、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人类,归根到底应该是诞生于发展、成长于发展、永远要不断发展下去的意义上定位,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主体构件、合理归宿。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并不仅仅是个一般性的实践或理性上的要求,它具有极其深远的蕴涵。可以说,邓小平为搞清楚这个问题,孜孜不倦地探讨了一生。他政治生涯中传奇般的“三落三起”,不就是宁愿自己忍辱负重、茹苦含辛,也要追求一条尽可能走得通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的愚昧和苦难中解放出来!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指挥若定、恢宏大度,不也是甘愿以自己最辉煌的晚年为代价,实实在在地摸索着走一条快速发展之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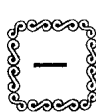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7 页。

使得能在 21 世纪将中华民族从一般发展中国家推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真正使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邓小平本人虽然没能亲自率领人们走完这条发展之路,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的厚重的历史之声波,将不断地激起无数涌动着的生命的内在共振,吟鸣出更加令人神魂牵绕的发展之史曲。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发展”问题所涉及的时间长度和空间维度都是十分久远和浩瀚的,非一般研究所能窥及。但从搞清楚邓小平试图是以什么表达形式去搞清楚这一问题开始,来搞清楚他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已经有哪些丰硕成果,开拓了哪些可能的研究思路 and 方向,提供了哪些珍贵的启发,却是现在能够进行也必须进行的研究。

### — “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邓小平曾总结性地谈过自己一辈子讲马克思主义,讲到最后其最根本的体验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sup>①</sup>很朴实,这同样也是邓小平的“发展观”最突出的理论风格。这一朴实的理论风格充分表现在其通俗性、原典性、解惑性诸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里,邓小平的语言表达几乎可以说是最通俗的。他最善于用最通俗的语言讲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发展道理。邓小平的所有关于发展的论述,只要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中国人,从字面上没有读不懂的;甚至对于由于种种原因而没上过学的中年以上的中国人,也能听别人念得懂。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

让一般群众能懂；这是邓小平对于理论阐释者的一贯要求。早在1950年5月，他在对新闻工作者的讲话中，就要求其在办报纸办广播时，“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有的小报就比大报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的需要，更通俗活泼。”<sup>①</sup>通俗性的要点有两条，一条是量方面的规定，即“能不能看那么多”，也就是不能冗长；一条是质方面的规定，即“看了懂不懂”，也就是用来进行表达的语言让群众自己最容易理解。

量上面的冗长与通俗性是必然相互排斥的。所谓冗长，必定以繁琐论证为骨架，而繁琐论证的最大特征就是钻牛角尖，在预设的迷宫里兜圈子，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后，最终是一场语言游戏，使人不知所云，结果是全无通俗性可言。邓小平力举反对这种冗长，他提倡要在“精”方面下功夫：“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sup>②</sup>就是好的长篇的东西，如果搞成形式主义也会变成冗长。避免形式主义的冗长的办法就是“要精，要管用”。“精”当然不是数量上永无休止地减缩，“精”的最佳点是“管用”。“精”是手段，“管用”是目的。离开了“管用”目的的单纯“精”的追求，则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形式主义。

质上面的容易理解与通俗性是天生相互溶合的，容易理解其本身就是通俗。邓小平在“容易理解”这方面真可谓典范，随手拈来举几例，都是非常精彩的。如在论述到在国家财政发展工作中，要服从中央宏观调控时，他说：“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这样，大家提出要求时就会更慎重一些了。这个批准权不应在财政部，而应在中央政治局。过去国家总预备费有相当一部分是买烧饼油条

---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用掉了,如1953年就是如此。现在有了这一条规定,就可以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有了这一条的好处,是让大家知道要动用总预备费不容易。总预备费是留着解决大问题的,不是用来买烧饼油条的。”<sup>①</sup>一句“买烧饼油条”,使人们很容易理解到全局与局部、长远与现在、大事与小事、控制与自由等等道理。再如在论述到在执政党干部队伍的发展中,要解决能上能下的问题时,他说:“干部总是要提拔一些新的。这几个方面加起来,每年最低限度要增加三十万左右的干部,十年就要增加三百万左右,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sup>②</sup>一句副职干部“要开两桌饭”,将从实质上破除干部终身制,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的历史必要性和紧迫性,阐述得明明白白。

很显然,邓小平这种通俗性的理论风格,丝毫不意味着邓小平的“发展观”理论上的浅薄。他是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述了非常深刻的道理。这种通俗性的理论风格是符合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所要求的。列宁说:“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sup>③</sup>不应该武断地在通俗性与浅薄之间划等号。确实,通俗性具有两个不同的可能发展方向。一个发展方向是浅薄,一个发展方向是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俗性的深刻具有

---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95、329页。

③ 《列宁全集》第5卷,第278页。

更大的价值：一方面它能使得深刻的理论凭借通俗性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传播；一方面它的驾轻就熟需要更高超的理论造诣和语言素养。一般来说，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理论，要比用晦涩的语言表达深刻的理论困难得多。它是一个更高的语和意的境界升华，它需要首先将晦涩的语言外壳与深刻的理论进行分离，然后将通俗的语言外壳与深刻的理论再度进行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经过加工改造，甚至使深刻的理论更加深刻。邓小平已经谙熟这一升华的方法，他的“发展观”的理论通俗性是这一升华方法的结晶。

二 邓小平的“发展观”的理论风格还浸润着醇郁的元典性。他构建的发展理论体系所表现出来的转型时代主题性、学术多延伸点性、应用多契合点性等，既原发于先秦诸元典如《周易》、《尚书》、《诗经》、《春秋》、《楚辞》、《老子》、《论语》、《庄子》等的既成风格，又高于这一风格，将中华元典的理论风格推向更集中、更典型的高度，使这更具民族性的理论风格更具世界意义。

第一，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大转型时期。自夏开始而延续了千余年的、以宗亲和姻亲血缘为纽带的、崇尚世袭国君和世袭贵族统治的奴隶社会，无可挽回地趋向衰败和蜕变。似乎稳固的现实政权控制的缺口被冲开了；似乎神圣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光环被亵渎了。一场大动荡、大变革开始了。春秋时期，历史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礼崩乐坏、王室败溃、强国争霸。其表面现象太混乱、太繁杂，以至于将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深深地潜藏起来。战国时期，历史似乎变得有理性了一些，表面的无序被各国相继变法图强所代替，某些内在本质性的东西开始显露，一个向崭新的社会的前进成为历史潮流。在这整个历史社会大转型时期，具有勃勃生机的社会存在必定产生与其相应的社会思考，即社会观、历史观、世界观等的思考。而首当其冲的、带有全局性的现实思考是“时代主题”问题。这一问题统帅着社会何以剧烈动荡、变革，何以

成功消震、重塑等问题。先秦时的伟大思想家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和回答了这一问题。如《周易》的“变易”、《老子》的“道”、《楚辞》的“国殇”、《论语》的“仁”、《庄子》的“无为”等，都是对“时代主题”问题的卓越定位。这也是它们之所以成为具有恒久魅力的中华元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实中国，也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由经典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由贫穷的社会主义向富裕的社会主义转轨，由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向合格的社会主义转轨。这种转轨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变革。在这场大变革中，旧的东西何以能顺利打破，新的东西何以能平稳建立，同样紧迫地存在着“时代主题”定位的问题。邓小平像先秦思想家们一样，思考着这一问题。但他又比先秦思想家们视野更宽阔。他根据历史愈来愈变为世界历史，世界愈来愈一体化的必然趋势，将中国的“时代主题”扩展为世界的“时代主题”。他界定道：“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sup>①</sup> 很明确，虽然人们一般认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邓小平却强调了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不解决好发展问题，世界的和平问题难以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也缺乏过渡的条件。并且世界和平问题和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本身就是发展问题。尽管发展问题解决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不解决发展问题则一切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却是一定的。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将人们以前曾经较为模糊的认识明晰、突现了出来，而发展问题又实质上是和中国和世界不可避免的长久话语背景和内容，所以也就使其理论如同中华元典一样，具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有了恒久的魅力。

第二,先秦元典的内容相对于后来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是非常简洁的。《老子》只五千余言,《论语》是语录简辑,至于《尚书》、《诗经》、《周易》、《楚辞》、《庄子》等都言简意赅。它们是诗、是散文、是随笔、是言说集,都洒脱抒意不拘一格。但它们又都追问反思的是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的最大最高最极终的问题,常常是点到为止,让袅袅余音自由飘散到渺渺的历史空间中去。这种简洁空灵的特点就使它们在学术上具有了多延伸点性,即为后人在它们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时,延发伸长自己的学术体系留下了许多出奇制胜的“活眼”,开拓了很宽很广自由发挥的空间。

例如汉董仲舒的“新儒学”之所以能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就是得益于先秦元典,特别是儒家元典的这种学术多延伸点性。本来,董仲舒并没有打出建构自己学术体系的口号,他确实主观上想完全按孔子儒学原本话语体系“代圣贤立言”“以述为作”,老老实实做一番诠释的工作。但由于孔子儒学中的概念、范畴、立论、推理等等,都预留了那么多“活眼”和空间,所以董仲舒只要对它们稍加清理、注释、引伸,就不可避免地建构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引进了自己的思想,从而变成了“为己立言”“以述代作”,创造了一个既与孔子儒学不可分离,又对孔子儒学进行了大变革的“新儒学”学术体系。有认为,董仲舒的治学功夫是高超的。其高超之处一是人们无法将孔子儒学从“新儒学”中分离出去,它们已经如晶粒结构般有序地溶合在一起了。二是“新儒学”比孔子儒学更理论化、现实化,它为汉代当时甚至后续整个中国古代的社会、自然、大一统政治秩序的价值合理性作出了有力的论证。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汉儒不同于孔孟”,“董仲舒的儒学所起的作用超过了孔子”。结论是“新儒学”高于孔子儒学。此说固然不无道理。但换个座标位看一看,如若没有始初的孔子儒学元典所具有的学术多延伸点性,哪里能出后来的“新儒学”。这就如同地壳运动时,其在不断隆起的过程中,

山峰虽然总是小于扩展绵延开来的山脉,但山峰总必竟是山峰,它永远是高高在上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是孔子儒学元典所具有的学术多延伸点性,使得它天生地高于“新儒学”。

邓小平的“发展观”乃至他的整个理论内容,也是非常简明的。这些内容有机地分布在他的一系列报告、谈话、批示、总结及工作安排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里,邓小平不像马克思有《资本论》、恩格斯有《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有《矛盾论》、《实践论》等长篇或大部头著作,但这正表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别具一格的独有特征。它象先秦元典中的那些诗、散文、随笔、言说集一样,表面上看是碰到什么具体问题则谈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实质上是高识远度地、十分精练地提出现时代中国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的提出甚至对世界和人类发展道路的探索都具有普遍意义。例如,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第一生产力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精神文明的问题、一国两制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一方面都提得非常概括、全面,使得短时间内人们不可能提出比他更概括、更全面的问题,这就使他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有关发展的学术热点、亮点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又都提得非常原则、理智,也是点到为止,留下了巨大的理论空间,也就使其具有了学术多延伸点性。正在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会不断地遇到这些问题,并且必须解决这些有关发展的问题。它的学术多延伸点性,必然会更加吸引和推动人们满怀兴趣和责任感地持久研究下去、解决下去,使得这一系统的“发展观”和理论延发伸长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征愈益明显,则其元典性就会愈加得到历史公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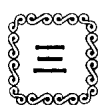
第三,先秦元典一般都具有应用多契合点性,即蕴涵了许多很容易在各各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能与实际应用相契合起来的理论兴奋点。例如《老子》这一先秦元典,提出了宇宙本原及其万事万物最最终的根据是形而上之“道”,并以“道”为核心,建构了完整

的“道”、“德”、“有”、“无”、“动”、“静”、“无极”、“无为”等范畴体系。后人可以在这每一个范畴点上，找到自己处理人与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契合点。人们应用其“清静可以为天下正”观点，消解人之间过度的功名利禄的纷争，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用其“以天下观天下”的原则，提高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感，将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到新的境界；用其“圣人处无为之事”标准，反对对自然的无休止的掠夺，将人的主体性和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结合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再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曾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这说明，《论语》本身就是孔子为解决弟子们的问题作出回答，而弟子们又在其回答中找到应用的契合点，遇到问题再问，反复契合而引吭出来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睿智之歌。

邓小平的“发展观”及其理论则是直指当今实践中的最重大最紧迫问题，是在超乎一般学者、理论家所能具有的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大舞台上碰撞出来的理性之光。邓小平是现实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则言什么问题，言到什么问题则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它的理论思路对于现实具有更多的应用契合点。可以这么说，现实中国发展中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可以在邓小平的理论那里找到启发的契合点，并且只能在这里才能更好地找到应用的契合点。此正如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中强调的：“这个理论总结近二十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成功和失误的历史教训，总结国际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

的前途和命运问题。”<sup>①</sup> 另外，邓小平的日理万机的繁忙决定了他没有那样多的“闲功夫”去争论，去更精致地构建他的理论，但由于这些解决现实发展中紧迫问题的各种思路，总是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哲学性的高屋建瓴式的把握，这就使这一思路运行的过程和方法对人们应用的契合点上的启示意义，往往超过了此思路的结论本身。这些能引出正确的结论，又能超越已有结论的思路轨迹和方法论，无疑更使其理论确实具有了超越一般时间、空间的永恒的意义。

总之，邓小平的“发展观”及其理论的风格，类似于先秦元典又高于先秦元典，是中国传统的理论风格的新发展。在马克思理论苑域中，是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各自理论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又一奇葩。



唐朝的韩愈在其《师说》中，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三**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师者应当传道和授业，为学者应当明道和习业。为师者的道和业如若要最有效地内化为为学者的道和业，解惑是关键和中介。解惑导致的是一个双向交流、吸收、提升的过程。通过对问题的解惑，为师者开创的道和业得到补充和丰富，为学者继承的道和业则更深刻和更全面。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导师，他的“发展观”及其理论的又一个鲜明风格就是解惑性。他善于在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就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解惑性的探索，他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不断地解惑的过程中完成的。

例如，在世界历史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人们的思想处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困惑之中。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说：“人们提出这样

---

<sup>①</sup> 载 1997 年 5 月 30 日《光明日报》，第 1 版。

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sup>①</sup> 他明确地解惑道：“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sup>②</sup> 在此，邓小平一方面对那些“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困惑进行了毫不含糊的解答：“要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更进一步提出更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高明地将解惑的思考引向更深的层次，没有这一方面问题的解惑，前一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空架子，只是一个表面口号。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可能开历史的大玩笑，就可能在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甚至在所不惜的重大牺牲后，回头一审视，原来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可以这么说，对这一问题的不断地解惑是邓小平的“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理论和实践结束，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开始之后，对于思想理论的发展，当人们还苦苦陷于“两个凡是”的困惑中时，邓小平提出和引导了要重新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权威的大讨论，将早已经被马克思铁定了的检验坐标系再次耸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从思想理论的混乱中解救了出来；对于各项工作的发展，当人们被“阶级斗争为纲”折磨得惶惶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116页。